

知识分子图书馆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加〕谢少波 著 陈永国 汪民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知识分子图书馆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

[加] 谢少波 著 陈永国 汪民安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加拿大)谢少波(Xie, S.)著;陈永国,汪民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8

(知识分子图书馆)

ISBN 7-5004-2557-0

I. 抵… II. ①谢… ②陈… ③汪… III.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2321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4

字数:15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11.00 元

## 《知识分子图书馆》编委会

顾问：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主编：王逢振 J. 希利斯·米勒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J. 希利斯·米勒 王 宁 王逢振

白 烨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李自修

刘象愚 汪民安 张旭东 罗 钢

章国锋 谢少波

## 《知识分子图书馆》部分书目

- ①文学行动<sup>\*</sup> 雅克·德里达
- ②解构之图<sup>\*</sup> 保罗·德曼
- ③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sup>\*</sup> 斯坦利·费什
- ④批评旅途：六十年代之后<sup>\*</sup> 莫瑞·克里格
- ⑤快感：文化与政治<sup>\*</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⑥布莱希特与方法<sup>\*</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⑦论解构<sup>\*</sup> 乔纳森·卡勒
- ⑧重申解构主义<sup>\*</sup> 希利斯·米勒
- ⑨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sup>\*</sup> 冈特·绍伊博尔德
- ⑩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sup>\*</sup> 罗钢 刘象愚主编
- ⑪抵抗的文化政治学<sup>\*</sup> 谢少波
- ⑫后革命氛围<sup>\*</sup> 阿里夫·德里克
- ⑬赛义德自选集<sup>\*</sup> 爱德华·赛义德
- ⑭政治无意识<sup>\*</sup>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 ⑮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sup>\*</sup> 特瑞·伊格尔顿
- ⑯本雅明文选<sup>\*</sup> 瓦尔特·本雅明
- 文化研究读本 雷蒙德·威廉斯等
- 历史和人文科学中的历史 拉尔夫·科恩主编
- 全球化中的知识左派 布鲁斯·罗宾斯
- 后现代性的起源 佩里·安德森
- 吉尔·德勒兹：哲学戏剧 米歇尔·福柯等
- 介入的区域 佩里·安德森
- 国际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文学实践 佛克玛主编
- 性贸易及其政治经济学 《社会文本》编辑部
- 狱中札记 安东尼奥·葛兰西

(注有\*的已出版。)

## 总 序

1986—1987年，我在厄湾加州大学（UC Irvine）从事博士后研究，先后结识了莫瑞·克里格（Murray Krieger）、J.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沃尔夫冈·伊瑟尔（Walfgang Iser）、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后来应老朋友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之邀赴杜克大学参加学术会议，在他的安排下又结识了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费兰克·伦屈夏（Frank Lentricchia）和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 Said）等人。这期间因编选《最新西方文论选》的需要，与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及其他一些学者也有过通信往来。通过与他们交流和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发现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各有所长，他们的理论思想和批评建构各有特色，因此便萌发了编译一批当代批评理论家的“自选集”的想法。1988年5月，J. 希利斯·米勒来华参加学术会议，我向他谈了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他说“这是一个绝好的计划”，并表示将全力给予支持。考虑到编选的难度以及与某些作者联系的问题，我请他与我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于是我们商定了一个方案：我们先选定十位批评理论家，由我起草一份编译计划，然后由米勒与作者联系，请他们每人自选能够反映其思想发展或基本理论观点的文章约50万至60万字，由我再从中选出约25万至30万字的文章，负责组织翻译，在中国出版。但1989年以后，由于种种原因，这套书的计划被搁置下来。1993年，米勒再次来华，我们商定，不论多

么困难，也要将这一翻译项目继续下去（此时又增加了版权问题，米勒担保他可以解决）。作为第一辑，我们当时选定了十位批评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里达、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伊瑟尔、费什、詹姆逊、克里格、米勒和赛义德等。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决定独家出版这套书，并于1996年签了正式出版合同，大大促进了工作的进展。

为什么要选择这些批评理论家的作品翻译出版呢？首先，他们都是在当代文坛上活跃的批评理论家，在国内外有相当大的影响。保罗·德曼虽已逝世，但其影响仍在，而且其最后一部作品于去年刚刚出版。其次，这些批评理论家分别代表了当代批评理论界的不同流派或不同方面，例如克里格代表芝加哥学派或新形式主义，德里达代表解构主义，费什代表读者反应批评或实用批评，赛义德代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德曼代表修辞批评，伊瑟尔代表接受美学，米勒代表美国解构主义，詹姆逊代表美国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伊格尔顿代表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研究。当然，这十位批评理论家并不能反映当代思想的全貌。因此，我们正在商定下一批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名单，打算将这套书长期出版下去，而且，书籍的自选集形式也可能会灵活变通。

从总体上说，这些批评家或理论家的论著都属于“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范畴。那么什么是批评理论呢？虽然这对专业工作者已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但我觉得仍应该略加说明。实际上，批评理论是60年代以来一直在西方流行的一个概念。简单说，它是关于批评的理论。通常所说的批评注重的是文本的具体特征和具体价值，它可能涉及到哲学的思考，但仍然不会脱离文本价值的整体观念，包括文学文本的艺术特征和审美价值。而批评理论则不同，它关注的是文本本身的性质，文本与作者的关系，文本与读者的关系以及读者的作用，文本与现实的关系，语言的作

用和地位，等等。换句话说，它关注的是批评的形成过程和运作方式，批评本身的特征和价值。由于批评可以涉及到多种学科和多种文本，所以批评理论不限于文学，而是一个新的跨学科的领域。它与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有这样那样的联系，甚至有某些共同的问题，但它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治性。大而化之，可以说批评理论的对象是关于社会文本批评的理论，涉及到文学、哲学、历史、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影视、绘画，等等。

批评理论的产生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60年代以来，西方进入了所谓的后期资本主义，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跨国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之后的时期或后现代时期。知识分子在经历了60年代的动荡、追求和幻灭之后，对社会采取批判的审视态度。他们发现，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文学艺术，出现了种种充满矛盾和悖论的现象，例如跨国公司的兴起，大众文化的流行，公民社会的衰微，消费意识的蔓延，信息爆炸，传统断裂，个人主体性的丧失，电脑空间和视觉形象的扩展，等等。面对这种情况，他们充满了焦虑，试图对种种矛盾进行解释。他们重新考察现时与过去或现代时期的关系，力求找到可行的、合理的方案。由于社会的一切运作（如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等）都离不开话语和话语形成的文本，所以便出现了大量以话语和文本为客体的批评及批评理论。这种批评理论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大学文科教育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辨析问题的能力。正因为如此，批评理论一直在西方盛行不衰。

我们知道，个人的知识涵养如何，可以表现出他的文化水平。同样，一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如何，可以通过构成它的个人的知识能力来窥知。经济发展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意味着文化水平会同步提高。个人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阅读的习惯和质量以及认识问题的能力。阅读习惯也许是现在许多人面临的一个问题。传统的阅读方式固然重要，但若不引入新的阅读方式、改变旧的阅读习惯，恐怕就很难提高阅读的质量。其实，阅



读方式也是内容，是认知能力的一个方面。譬如一谈到批评理论，有些人就以传统的批评方式来抵制，说这些理论脱离实际，脱离具体的文学作品。他们认为，批评理论不仅应该提供分析作品的方式方法，而且应该提供分析的具体范例。显然，这是以传统的观念来看待当前的批评理论，或者说将批评理论与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或理论混同了起来。其实，批评理论并没有脱离实际，更没有脱离文本；它注重的是社会和文化实际，分析的是社会文本和批评本身的文本。所谓脱离实际或脱离作品只不过是脱离了传统的文学经典文本而已，而且也并非所有的批评理论都是如此，例如詹姆逊那部被认为最难懂的《政治无意识》，就是通过分析福楼拜、普鲁斯特、康拉德、吉辛等作家作品来提出他的批评理论的。因此，我们阅读批评理论时，必须改变传统的阅读习惯，必须将它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来理解其思辨的意义。

要提高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要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这就需要像经济建设那样，采取一种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成果的态度。对于引进批评理论，还应该有一种辩证的认识。因为任何一种文化，若不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存在。正如一个人，若无他人，这个人便不会形成存在；若不将个人置于与其他人的关系当中，就不可能产生自我。同理，若不将一国文化置于与世界其他文化关系之中，也就谈不上该国本身的民族文化。然而，只要与其他文化发生关系，影响就是双向性的；这种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既互相吸引又互相排斥。一切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联系；只有不断吸收外来的新鲜东西，才能不断激发自己的生机。正如近亲结婚一代不如一代，优种杂交产生新的优良品种，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应该互相引进、互相借鉴。我们无需担忧西方批评理论的种种缺陷及其负面影响，因为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已经变成了无意识的构成，这种内在化了的传统因素，足以形成我们自己的文化身份，在吸收、借鉴外国文化（包括批评理论）中形成自己的立足点。

今天，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的内在作用或市场经济和资本的运作，正影响着世界经济的秩序和文化的构成。面对这种形势，批评理论越来越多地采取批判姿态，有些甚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一些保守的传统主义者抱怨文学研究被降低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对文本的分析过于集中于种族、阶级、性别、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等非美学因素。然而，正是这种批判态度，有助于我们认识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内在逻辑，使我们能够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更好地思考自己相应的文化策略。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编译这套丛书的目的之一。

在这套丛书的编选翻译过程中，首先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对出版的保证；同时要感谢翻译者和出版社编辑们（如白桦、汪民安等）的通力合作；另外更要感谢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热情鼓励和支持。这些学者们认为，这套丛书必将受到读者的欢迎，因为由作者本人或其代理人选择的有关文章具有权威性，提供原著的译文比介绍性文章更能反映原作的原汁原味，目前国内非常需要这类新的批评理论著作，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无疑会对这套丛书的质量提供可靠的保障。这些鼓励无疑为我们完成丛书带来了巨大力量。我们将力求把一套高价值、高质量的批评理论丛书奉献给读者，同时也期望广大读者及专家学者热情地提出建议和批评，以便我们在以后的编选、翻译和出版中不断改进。

王逢振

1997.10. 于北京

# 道德、政治欲望和《政治无意识》 里的乌托邦主义

(代前言)

少波在其论著翻译出版之际嘱我写篇前言，考虑再三，不敢从命。因为他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一直在卡尔加里大学从事文论教学和研究，其理论功底之扎实，对现状了解之广博，均在我之上。他出国前曾在湖南师大获硕士学位并在那里任教多年，最近几年又经常回国交流，对国内情况也非常熟悉。所以为他的论著写前言无异于画蛇添足，更何况他自己已有一篇很好的导言。然而，为了表示与他的友谊，我愿意不揣浅陋，以自己的一篇文章加入他所作的讨论，姑且算作是代前言吧。

《政治无意识》迄今仍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研究论著，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这部著作里，詹姆逊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辩证理解，发展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他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双重力量——前者称作意识形态，后者称作乌托邦。正是这种乌托邦的概念构成了詹姆逊马克思主义解释的道德冲力。

但是，詹姆逊是否真的是个乌托邦主义者呢？按照某些定义，他显然不属于乌托邦的范畴。例如，巴巴拉·古德文认为，“乌托邦突出表现一个总体社会规划，全面描绘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对

比之下，坚持局部时尚理想或从不将它们纳入理想社会的理论家决不是乌托邦的。”<sup>①</sup>根据这种论断，詹姆逊自然不属于乌托邦范畴，因为他缺乏传统乌托邦标准的那种“大画面”。

古德文在她与凯恩·泰勒合写的《乌托邦的政治》里，对乌托邦和乌托邦主义的概念也作了区分。她认为，乌托邦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是提供一个可替代社会的“蓝图”，而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则强调包含乌托邦因素的思想形式。<sup>②</sup>显然，后一种概念可以把詹姆逊纳入乌托邦传统。因为，詹姆逊的作品虽然远未提供一个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但他的乌托邦主义却与乌托邦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这就是对社会进行批判，并欲求一个可选择的社会，一个消除异化结构并在人民之间创造真正和谐的社会。对詹姆逊来说，在《政治无意识》里这种批判就是指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实际上，正是通过一些复杂的概念——伦理的、个人的、集体的、意识形态的——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参与了乌托邦理论。

对《政治无意识》里的乌托邦主义，应该通过一些集中起来的因素来分析。首先，要考察詹姆逊对有关当代文学批评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伦理的重构；其次，要考察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如何使这种重构成为可能。因为只有理解这种重构以及詹姆逊所说的它的必然性，我们才能理解他阐释中的乌托邦因素，理解这些因素与意识形态之间的那种张力。在詹姆逊的运作中，传统伦理问题的词汇被重写或置换，变成了他自己的专用词语，从而将伦理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现代主义话语，用于“个人”并受“个人”限定。这种区分反过来又使他的乌托邦观念发生作用，因为这样一来乌托邦便不再是一个范畴，其意义“充满”正义、道德、平等的理想；相反，乌托邦被等同于一种思想形式——集体思想，它被有效地推到了人们（政治）无意识的下边。

詹姆逊呼吁，当代批评应该超越伦理，“在政治和集体方面超越伦理”。<sup>③</sup>为了理解他的乌托邦主义的特征，我们还应该了解他要求超越伦理及重构这一范畴的动机。在《政治无意识》的导言

里，詹姆逊写道，“伦理批评是今天文学和文化批评的主要形式”<sup>④</sup>。他认为，文本这种“虚弱的重写”形式局限于个人的范畴，未能论及其文本研究客体的更大的延伸。因此，詹姆逊的解释方法及其三个同心视域的目的是：超越导致伦理批评的任何个人冲动，承认一切道德性的内容都是关怀和利益的升华，而它们最终都是政治性的。<sup>⑤</sup>无疑，对这一点任何人都不会感到惊讶；但在讨论詹姆逊的文本时，重要的是区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道德批判和他自己在《政治无意识》里的伦理介入。

在通过文化而延续的意识形态信念里，道德性是马克思主义批判中最基本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认为，道德必须被理解为处于特定生产方式的框架之内，这些生产方式不依赖于意志和外来的实践力量，不仅独立于孤立的个人，而且独立于他们的整体，总是居于人们之上。<sup>⑥</sup>正是这些由现存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产生的“外来的实践力量”，通过消除可能存在的有理性（自由）意志的主体，排除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所提出的那种道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唯心主义者忽视了物质力量的综合网对社会个人的作用。因此出现了个人与整体利益之间的“表面矛盾”，而整体利益是他们关于道德话语的基础。“在个人利益获取作为阶级利益的独立存在的过程中，个体的个人行为必然经历实在化、异化，同时作为一种独立于他自己、外在于他自己的力量而存在，它由相互关系产生，因而变成了社会关系，变成了一系列决定并支配个人的力量，因此在想象中它们似乎是‘神圣的力量’。”<sup>⑦</sup>当观念脱离它们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时，它们便呈现为社会必须服从的普遍的概念形式；这是一个既使特定时代的权力结构合法化又使它长期存在的过程，这种权力结构本身既是理想概念的始源又是它们的实现——也就是说，是它们的整个过程。在这种把概念作为理想的普遍利益的投射过程中，某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所特有的生活经验条件最终会支配个人，以跨越历史的方式成为道德的律条。当道德因此被作为普遍利益并被

意识视为理想时，它就变成了附属现象，不再被认为产生于社会存在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产阶级的道德批判，并不包含用一套道德规范代替另一套道德规范；相反，它们强调在道德下面透过理念观察到它的物质基础。他们把道德限定为意识形态，限定为附属现象和上层建筑。如此一来，道德便不能成为社会变化的力量，那种变化属于物质存在条件的变化，因而道德只能采取一种原则规范的形式，将它的活动孤立到个人的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通过“在特定生产方式的框架内”<sup>⑧</sup>理解道德，提供了改变物质生活条件、消除私人与普遍利益冲突的基础，从而可以承认一系列不断由人类实践产生和破坏的道德准则。

通过承认私人和整体利益源于同样的“人类个人的发展”——就它们同样都是物质条件的产物而言——这些利益就获得了达成一致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确立集体利益，使私人和整体利益相互一致。但这样一个阶段只能通过社会群体来产生。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私人和整体利益的分离“只能通过个体的人来消除，再次……使物质力量服从于他们并消除劳动分工。没有社会群体这是不可能的”。<sup>⑨</sup>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革命只能通过集体性实现。

正是这种集体生活的前提（集体生活是詹姆逊阐释中的乌托邦本质所在），改变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里“伦理”的批判基础——他的批判采取了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形式。詹姆逊断言，马克思所指的那些论道德的话语条件不是他自己所用的话语条件；他的研究客体——伦理——是受到现代主义和后期资本主义的个人范畴的启发，而个人范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终战场。他说：

把今天大量平常的文字批评说成是“伦理的”，仍然会使读者感到自相矛盾甚至有悖常理，而我们通常却据此来理解

那种道德化的或道德主义者的说教姿态……这等于曲解了伦理在我们自己境遇中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它本质上是心理的和心理化的，甚至在为权威性而诉诸这种或那种心理分析的地方亦是如此。这里个人身份的概念，精神重新统一的神话，以及容格的“自我”或“本我”的幻象，都作为旧的道德感性和伦理意识的主题参与进来……<sup>⑩</sup>

这种容易混淆的伦理观，也许最好以实例来说明。在《批评的伦理学》里，陶宾·赛伯斯认为文学批评的“危机”是试图以语言代替人的后果。这一转变源于后结构主义的表意观，即否认启蒙人文主义的假定，突出语言符号的循环构成意义而不是个人表现的主体构成意义。这种观点之所以能够成为詹姆逊观点的例证，是因为赛伯斯认为这是一种“伦理的”危机——他认为从表现的主体转到语言的主体是物化的最终形式，“从我们的生活中剥去了一切人类的标志”。<sup>⑪</sup>换言之，人类等同于中心的、理性的个人。

就伦理的现代主义表现而言，詹姆逊认为伦理是对自我或本我的承诺，是对个人范畴的承诺，个人范畴已经成为最终的解释视域——也可以说是一种遏制的策略。如此一来，“伦理”便被置于与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政治和集体任务直接相对的地位。甚至现代主义对弗洛伊德的分裂主体的赞同，也被那种相信过去可恢复的信念掩盖，似乎过去可以重新汇集于中心的主体，使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自我“以某种方式统一在关于自己的某种主动的明晰之中，统一在关于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行为的决定之中”。<sup>⑫</sup>

于是，詹姆逊在谈到解释时认为，伦理批评构成支配性的代码，根据这种代码，“它是什么意识？”的问题有可能得到回答。<sup>⑬</sup>在他看来，这一问题的基础是设想文本和心理的意义可以分别围绕文本或个人心灵的实情统一起来。由于与那些“全都以某种方式投射出意识的统一性或连续性”的伦理代码相对，<sup>⑭</sup>所以詹姆逊

的阐释方法认为文本具有一种无意识的或其他的表现机制，它要求超越文本自身表明的意义——超越那种以“它确切说的是什么”来回答“它有什么意义？”所引发的东西。按照拉康的看法，提出“它有什么意义”可能会使人得到“现实”，但决不是“真实”。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詹姆逊的乌托邦轨道暗中引导着他。

拉康的“真实”领域的概念，阿尔都塞的历史作为不在场的原因的概念，对詹姆逊用于解释的叙事理论的发展有着根本的作用。事实上，这种叙事理论是一种认识论——就是说，詹姆逊认为，叙事性是人类思想的基本状况。在《结构主义的时代》里，伊迪丝·科兹威尔说明了构成詹姆逊解释的那种理论结构的逻辑：他从列维-斯特劳斯借用了“野性的思维”，从阿尔都塞借用了历史作为不在场的原因的概念，从拉康借用了“真实”的概念和无意识作为语言功能的概念，而所有这些人都是结构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各种不同的结构主义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试图达成对统一人类的基本结构的认识——“试图系统地揭开深层的、普遍的精神结构，因为它们明显存在于亲属关系和更大的社会结构之中，存在于文学、哲学和数学之中，也存在于促动人类行为的无意识的心理学模式之中。”<sup>⑩</sup>因此，十分明显，它表明了为什么构成政治无意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会关注这些结构主义思想家。因为詹姆逊的解释逻辑（或本体论的乌托邦主义）根据叙事是体验现实的方式这种看法而定，所以叙事总是那种已经在发生作用的集体的空间。

不过，拉康也许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结构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里）和特丽尔·莫伊（在《性的/文本的政治》里）都曾经提出了这点。他们二人认为，拉康在其对弗洛伊德的重新解读中是个后结构主义者，因为他从语言学方面重新解释了俄狄浦斯情结的场景。事实上，对拉康来说，俄狄浦斯情结危机是能指和所指统一性遭到破坏的结果——而这种统一性是由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提出来的。在拉康的理论里，正是这种对



能指与所指之间裂痕的强调使它具有了后结构主义的特点。然而，按照拉康从理论上阐述的这些表意阶段间的密切关系，很难确定他的立场完全是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正是拉康理论的这种性质才吸引了詹姆逊的注意。因为詹姆逊的解释本身就依赖于结构及其不在场这二者之间的作用。

简单说，拉康的理论由三个方面构成：想象、象征和真实。在《性的/文本的政治》里，特丽尔·莫伊简要地把想象说成对应于前俄狄浦斯阶段（或镜像阶段），“孩子相信他是母亲的一部分，看不到自己与世界的分离。”<sup>①⑥</sup>这样，想象不以任何差异或不在场为标志；它是统一性和认同性的空间。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我们可以认为在镜子面前端详自己的孩子是一种‘能指’——能够赋予意义的某种东西——他在镜子里看到的形象是一种‘所指’。孩子看到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本身的‘意义’。这里，能指和所指和谐地统一起来，就像在索绪尔的符号中那样。”<sup>①⑦</sup>在想象阶段，主体和客体合二为一。

但象征阶段，即获取语言的阶段，与想象的阶段颠倒了过来，变成了“他性”、分离以及压制与母亲统一的欲望的领域。<sup>①⑧</sup>在这个阶段，由于父亲的出现，孩子意识到身份和差异，“身份只能以差异的结果出现——主体只有排除其他的主体才能成为主体”。<sup>①⑨</sup>就是说，孩子意识到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只有根据符号彼此间的关系、根据身份和差异它才能获得意义。拉康认为，对性别差异和语言的同时发现，构成孩子进入象征秩序的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形成了无意识，将主体在有意识的自我和被压抑的欲望之间分裂。孩子了解到“一个符号预设了它所表现的客体的不在”。<sup>②⑩</sup>于是，语言本身变成了一种欲望的力量，力求表现不在场的东西。换句话说，欲望是符号表意链条的运动。詹姆逊把这种欲望政治化为对集体生活的欲望，而正是这种政治化使他把乌托邦纳入了渗透着意识形态的叙事。

在《雅克·拉康和精神分析哲学里》，爱丽·拉格朗-苏利文把